

亚欧草原野兽风格若干纹样研究^①

沈爱凤(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摘 要] 亚欧大草原诸民族艺术表现以“野兽风格纹样”而著称, 这种草原艺术的造型极为丰富, 既体现了种种古老文明对草原的影响, 也体现了草原民族的创造力量。本文就“野兽风格纹样”的造型特点和部分纹样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概要研究。

[关键词] 斯基泰三要素, 野兽风格纹样

[中图分类号] J5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75 (2009) 06-0054-08

我在《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一书已经讨论了一些草原艺术问题, 但关于“野兽纹样”的讨论比较分散, 尤其是关于环形动物、一人双兽和与龙相关的造型讨论得很含混, 本文将专门讨论这几种特别重要的“野兽纹样”。

近年来, 亚欧大草原艺术日益受到关注, 核心问题之一, 就是“野兽风格纹样”。这些纹样出现在草原民族几乎所有器具上, 是草原艺术的根本造型。最初, 西方学者认为这种风格是斯基泰民族首创, 遂把它们纳入以斯基泰民族冠名的“斯基泰三要素”(马具、兵器和野兽风格纹样)之中。但近期的田野考古调查发现, “斯基泰三要素”的出现早于斯基泰时期, 最早出现在亚欧大草原的东部地区, 而后传遍大草原, 其中野兽风格的起源涉及了整个亚欧大陆。

“野兽风格纹样”是指古代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用动物的形象来装饰各种物品, 如武器、带钩、镜子、锅罐、刀剑、箭筒、马镫、杆尖、衣着、地毯、刀把等。动物形象包括有角鹿、熊、鸟头、马、牛、犛牛、狮、虎、狼、翼虎、多头狼、鹰、鱼和怪兽等。^[1]“野兽风格纹样”(Animal Style)概念为西方学者率先提出的, 指称西欧、北欧和俄罗斯等地的古代艺术风格, 也指亚欧大草原的艺术风格。20世纪初, 瑞典学者伯恩哈德·萨林(Bernhard Salin,)将北欧中世纪艺术分为斯基泰的纳维亚I型、II型和III型。其中, 斯基泰的纳维亚I型指一种出现在北欧的动物风格纹样, 并认为这种风格很可能最初由亚欧草原传入欧洲, 之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 特点是在装饰物的空白处密集填充扭曲的、夸张的、抽象的或片断的动物纹样。俄裔美国学者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罗斯托夫采夫(М. И. Р о с т о в ц е в)所著《南俄与中国的动物纹样》(The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1922)标题, 就直接使用了“野兽风格纹样”一词。

“野兽风格纹样”以大角鹿、马、虎、豹、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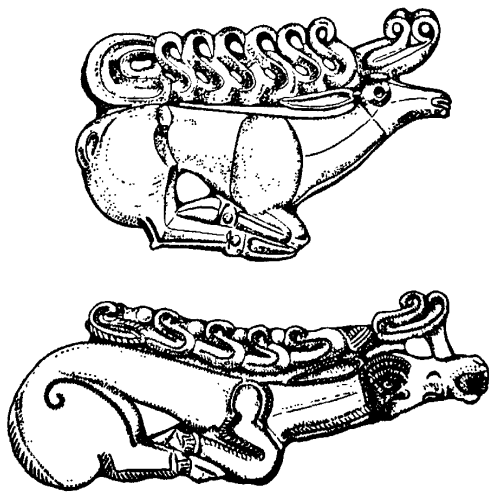


图1 斯基泰黄金大角鹿, 上为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
下为匈牙利布达佩斯博物馆收藏

野猪、牛、羊等为主要表现对象, 也常见有大西域的格里芬、斯芬克司造型, 以及中国龙、凤凰等造型。草原野兽风格主要造型有: 1. 夸张重复鹿角是普遍的通行的手法; 2. 对称的动物图案, 如双马神造型; 3. 环形或旋转, 甚至将前后身体扭转180°, 以表现动态; 4. 在大的动物纹样内重复同种的小动物造型; 5. 猛兽袭击食草动物; 6. 方形的装饰图案; 7. 其它手法, 如一人双兽造型, 如混合各种造型于一体, 还有一些单独的顶饰。

以下在“野兽风格造型”的范围内, 选择六种类型特征的草原纹样, 概要讨论其艺术特征, 并简要讨论某些纹样的起源等问题。

一、大角鹿纹样和相关造型

人们所熟悉的“斯基泰风格”最明显特征, 就是强调、夸张和重复鹿角的造型特征。在大角鹿造型中, 草原艺术家以夸张和重复的手段塑造出鹿角的特殊造型, 具体手段就是把鹿角主枝拉长到等同

收稿日期: 2009-07-10

作者简介: 沈爱凤(1963—), 男,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 外国艺术史。

①基金项目: 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我国西北部古代艺术的文化多样性研究——亚欧内陆与古代中国的文化交流》。(07BA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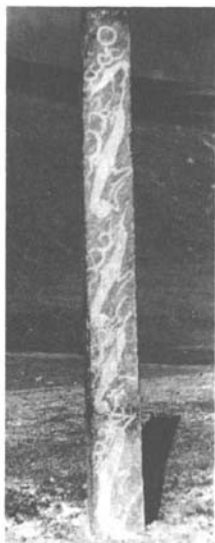


图2 三道海子鹿石
青河县查干郭楞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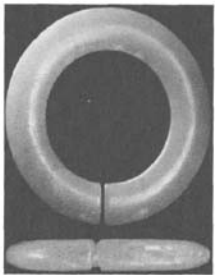


图5 兴隆窪出土块饰,
前6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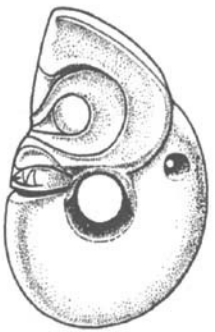


图6 玉猪龙线描图,红
山文化之牛河梁出土,
前四千纪—前三千纪



图7 阿尔让古墓出土的
头尾相联的野兽, 青铜,
公元前8世纪, 俄罗斯
图瓦博物馆

身体的长度,并重复许多鹿角分枝,这种造型广泛见于各地,具有普遍性。

北高加索地区科斯特隆姆斯卡亚古墓(Костромская курган)出土一件《大角鹿黄金牌饰》(前6世纪早期,图1上),呈蹲踞式,头部昂扬向上,最鲜明的是长长的鹿角上沿主枝重复了六个S形分枝,加上向前的两个S形分枝和鹿角的结束部位,共构成九个连续排列,是斯基泰风格的典范样式。匈牙利布达佩斯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几乎一样的作品(前4世纪,图1下)。阿尔泰文化中也有同样的造型,如东哈萨克斯坦的契尼克宁斯基古墓5号墓(Чиникинский курган No5)出土了几件《黄金大角鹿牌饰》(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前7世纪—前6世纪)。

苏联有学者认为,斯基泰之分支塞种(Sacae)族名的词根sak≈鹿。据此,一些学者认为斯基泰的意思就是“猎鹿的人”,甚至认为,鹿就是他们的图腾。^{[2][5][13]}而实际上,大角鹿造型出现在草原文化的许多作品中,其起源早于斯基泰民族的出现,如图瓦的阿尔让古墓(Аржан курган)2号墓就有早期鹿石出土,上面刻有大角鹿的形象,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

大角鹿和羚羊是极为常见的草原造型,在几乎各个地方,这种造型的杆尖比比皆是。另外,许多鹿石上皆有这种鹿角的连续重复。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有一组《桃红巴拉形铜鹿》(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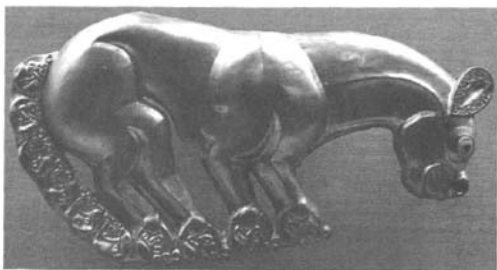


图3 豹子黄金饰牌,克列尔梅斯基古墓出土



图4 虎鸟纹饰牌,战国,共12件,阿鲁柴登出土

国),具有明显的大角鹿特点。而在蒙古、新疆等地出土的早期鹿石中也有,如新疆三道海子的大石冢就有可能是独目人的王陵,其鹿石正面的鸟嘴神兽造型的头部主要是大角鹿的重复造型(图2),林梅村认为,三道海子的鹿石是独目人的艺术遗存。^[3]

在尾部或其它部位以重复的方式塑造若干与它同种或不同种的小动物头部,也是草原纹样的一个特点,大抵是关于部族繁衍的象征或祈祷更多的捕获量。

北高加索地区克列尔梅斯基古墓(Келермесский курган)出土一件《豹子黄金牌饰》(前6世纪早期,图3),豹子呈站立状,头部冲向地面,尾巴上重复表现了六只小豹子,每一个小兽就是一个缩小了的头尾连接的环形猛兽造型,豹子的四只爪子也很有意思,抽象难解。

吉尔吉斯的伊塞克古墓(курган Иссык)出土的《伊塞克鹿形黄金牌饰》(前5世纪—前4世纪),鹿角形状与鹿石一样作涡卷重复,为典型的斯基泰造型。鹿形动物的造型和翅膀模仿了格里芬。还有图兹达克谷《狼造型的手镯》(Урочище Туздук,前3世纪),沿着狼的背脊直到尾部,连续装饰着十个重复的鸟嘴小兽头,具有浓厚的草原特色,是塞种艺术的珍品。

鄂尔多斯高原阿鲁柴登出土的《虎鸟纹牌饰》(前3世纪,图4)与伊塞克湖《鹿形黄金透雕牌饰》大同小异,虎头上也长出了大的鹿角,鹿角的顶端环列八个小的似鸟的兽头。

所以,大角鹿造型是最鲜明的草原特色之一,

它适应于牌饰和鹿石等各种形式，是草原民族艺术的独特创造。

二、环形和旋转的动物造型

环形的种种野兽纹样是草原最为古老的动物造型之一，起码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的玉猪龙造型，这种造型关注的是环状动物身躯。到了青铜和铁器时代，亚欧大草原各地也出现了种种旋转性的猛兽和食草类的动物造型，其旨趣主要着眼于动物的运动状态。环形造型的起源涉及到极为古老的环形动物石雕造型，有些环形石雕造型中间是断开的。近年来，这些问题引起了一些从事东北亚古代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的关注。

有学者认为，上古这种造型与东北亚早期文化中的玦饰有关，什么是“玦”？早在19世纪末，吴大澂在《古玉图考》中把一种如环而有缺口的玉器称为“玦”。关于玦饰的研究近年来为中国、中国台湾、日本、菲律宾、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学者广泛关注，被认为是早期玉文化中的重要课题。多数学者认为，玦的起源始于东亚，尤其是东北亚^[4]。

新近二十年来，在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辽河流域之兴隆窪文化遗址（前7世纪~前6世纪）有重大考古发现，这里出土的大量精美块饰把玉文化的成熟期推到了距今八千年前。此后，玦饰从辽河流域向四方传播，远达河姆渡文化（前5世纪~前4世纪）、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和日本列岛，甚至到达东南亚地区^[5]。根据兴隆窪饰（图5）的精美程度，很可能玦饰的起源更应推前到一万年左右。最早的玦饰十分单纯，为圆环状或C形器，但制作手段一定很费时费工，磨制石片、管钻、以绳线切割和抛光等技术很麻烦。而与动物造型发生联系的环形器，应为较后形成的样式，如红山文化之牛河梁遗址的玉猪龙造型（前4世纪~前3世纪，图6）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大型《玉龙雕刻》（公元前3000年）等。

红山文化之玉猪龙造型，可能是亚欧大草原边缘最早的环形动物造型，兴隆窪玦饰和玉猪龙造型这些特色是西亚所没有的。这些特定的具有显著特点的艺术造型可能具有中心发源地，并且甚至早于草原民族的形成，兴隆窪文化与红山文化前后皆兴起于石器时代，那时候草原民族还没有真正形成规模，但是从以后草原青铜时代的环形器来看，兴隆窪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可能通过一系列中间的文化类型，最终影响了较后兴起的草原文明，其种种变化造型最终汇入到了草原艺术语汇之中。

亚欧大草原的环形动物造型主要是指较后兴起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制品，当时出现了种种环形的以铸造技术制作的猛兽造型，如阿尔让遗址等

地出土的环形虎豹造型（前7世纪~前6世纪，图7）其他还出现了更多的类似造型，如克里米亚库拉科夫古墓（Кулаков курган）出土蜷曲的野兽青铜饰牌（前5世纪），又如我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土的类似的蜷曲野兽黄金饰牌（前4世纪~前3世纪）。它们头尾相连的造型特色非常鲜明。这些造型有可能受到了更早时期的玉石文化特别是玦饰造型的影响，有可能是以新材料对这些更早造型的模仿，或者就是对这些早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铸造的技术手段使得制作这种造型变得更为简便。当然，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我不可能拥有更多的更全面的能够涵盖全部时期和地域的材料，因而无从得出可靠的结论，这一问题期待学术界刊布更多的资料再来认识。

此外，草原艺术造型中还有大量旋转的造型，它们可能与环形造型具有关系，也可能是环形动物造型的深化发展。但也可能是阿尔泰山—南西伯利亚民族的一种新的艺术创造，直接来自对动物奔跑形态的观察。特别是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一些造型细节上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变化和发展，如各种动物的造型相互混合，旋转的动物前后身的相互扭转。草原民族对于这种旋转纹样具有神奇诡异的复杂构思，有很多变形夸张的处理手段，包括前半身和后半身扭转180°的造型，这



图8 巴泽雷克古墓主身上的部分纹饰线描。原件藏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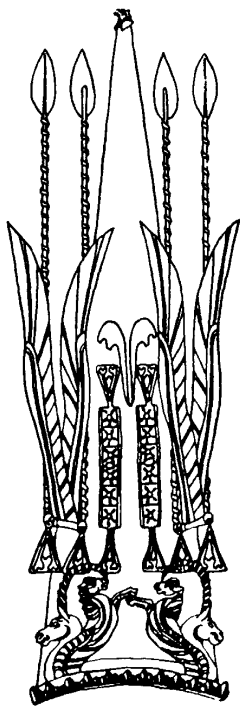


图11 伊塞克湖塞种金人墓出土金帽正面示意图



图9 格里芬袭击马匹，彼得大帝的西伯利亚藏品，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种装饰手法，是为了夸张动物奔跑的速度。

巴泽雷克古墓(Пазырык курган, 公元前5世纪)出土的男主人全身刺青的完整人皮被保存下来，其双臂、小腿部以及胸、背局部皆绘有精美图案，该物品藏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图8)，纹样自上而下分别是：带有鹿角的有蹄目、鹰嘴猫科动物、带鹿角的鸟嘴有蹄动物、绵羊和格里芬袭击有蹄目。特别是双臂上的各种混合造型的奔跑动物，特点即前后身扭转180°。

相同的表现手法也见于伊塞克湖塞种金人墓，其出土的剑鞘上的黄金装饰(前5世纪—前4世纪)，分别表现奔跑的马和驯鹿，它们的前后身也旋转了180°。在彼得大帝的西伯利亚宝藏中，有一件《狮头格里芬袭击马的腰牌饰》(图9)，其中的马匹前后身旋转了180°，表现了马匹的挣扎。这些夸张的手法充分反映了游牧民族对动态的敏锐观察力。

环形动物的造型之起源可能非常古老，而旋转的动物纹样也是草原艺术具有代表意义的造型之一。亚欧大草原各民族文化与匈奴文化之间的关联具有悠久的历史，通过阿尔泰、塞种和鄂尔多斯等一系列中间文化形态得到了体现。

三、“双马神”造型

对马的驯化使用和各种马具特别是马镫的发明，以及应骑马所需而发明的长裤，是草原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在北方草原上，双马神奈撒特耶(Nāsatya)是泛印欧语系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祇之一，随着泛印欧语系人的迁徙，双马神的名号和形象传遍了大草原、西亚、中亚和印度，可以说，双马神伴随着草原民族的成长和壮大，见证了草原的兴衰。

双马神造型最早出现在铜石并用时代的颜那亚文化之中，后来在米坦尼文、波斯、印度、斯基泰、吐火罗文化中广泛出现。在许多古老文化的遗址里，皆发现对马的崇拜。在亚速海西北海岸诺瓦阿列克谢耶夫卡(Новоалексеевка)颜那亚文化古墓里，发现一具婴儿骨架放置在两个



图10 西伯尔罕黄金之丘大月氏金龙守护国王挂饰，喀布尔国立博物馆

马头之间，在克尔诺索伏卡(Керносовка)发现有颜那亚石人像，其下方刻有双马神图像。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有一处颜那亚墓地，不仅发现双马殉葬的风俗，还发现双马神小石雕像。林梅村认为，这些小石雕像就是“黄金之丘”3号墓《双龙守护国王金头饰》双龙造型的祖型。^{[6]8-9}

《双龙守护国王金头饰》(前1世纪~公元1世纪，图10)是阿富汗西伯尔罕“黄金之丘”(Tillya-tepe, Shibarghan)发掘品中最著名的一件。其双龙具有显著的双马神特点，马脖子和马鬃形态十分清晰。龙的造型带角，飞翼可能受到格里芬的影响，臀部有水滴形纹饰，以红绿宝石镶嵌，像神秘的眼睛，马鬃和下面的小挂件等处还有一些绿宝石镶嵌的水滴纹。林梅村指出，大月氏的龙神表现了马蹄和马鬃，并成双出现，乃溯源于印欧民族古老的双马神奈撒特耶。^{[6]8-10}

1969年发现的伊塞克湖附近金人墓出土有遗骨和金制尖帽等，保存完好，复原后的死者衣装为身穿黄金铠甲和黄金护腿，佩宝剑，头戴金光灿烂的金枝尖冠，被认为是塞种王族或显贵。从哈萨克文版的图片来看，《伊塞克湖黄金甲和金制尖帽》(前5世纪—前4世纪，Курган Иссык)有类似步摇的四枝金叶，正面有对称的双马神立体黄金雕刻造型，带有羚羊弯角和飞翼^[7]。从黑白线描示意图(图11)的细节来看，大双马神飞翼的尖部多出一对较小双马神，方向与大的相反，并有前蹄作飞跃状，结构巧妙^[8]。

在整个亚欧大陆，对于双马神的崇拜，是相当普遍的，随着草原民族向各地迁徙，双马神走遍了天下。西面的赫梯和米坦尼的协约上写有双马神名号。乌拉尔图阿尔腾特佩神庙壁画菱形四叶纹样两边蹲坐着双马，头部有缺损，但马蹄和马鬃清晰可见。卢里斯坦、波斯艺术的雕刻和装饰中常见有双马神造型，古波斯石柱顶端有联体双牛等造型，应当和双马神有关。在斯基泰、萨尔马提亚和塞种等文化艺术中，都有大量双马神造型。印度宗教里有一对双马童称阿湿波(Aśvin)。俄罗斯图瓦的阿尔让2号遗址出土有双马金片，图瓦西部萨格雷—巴泽2号墓(Магильник Саглы-Бажи II)出土一个马身饰板(图12)，马身内部具草原抽象图案。

在我国北方天山、阴山、内蒙古、新疆巴里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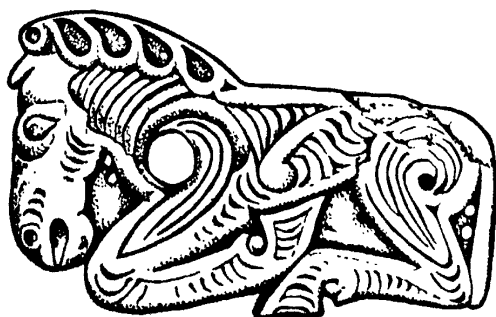


图12 马饰板，萨格雷-巴泽2号墓出土，前5世纪-前3世纪



图13 双马纹青铜镀金带扣，鄂尔多斯出土，公元前3-前1世纪，大英博物馆



图15 装备有弓箭的格里芬，第聂伯河梅尔古诺夫古墓出土

等多处岩画上均发现有双马神造型，在内蒙古、宁夏、新疆、河北等很多地方也发现有双马神金牌饰。新疆地区昌吉呼图壁县雀尔沟镇附近，在一处叫“康家石门子”的岩画上，发现有双马神造型，王炳华将该岩画断为公元前一千纪前半期，推测可能与塞种民族的活动有关。^{[6][15]} 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土的《双马纹青铜镀金带扣》（前3世纪~前1世纪，藏大英博物馆，图13）非常典型的反映了这种影响，双马相对为标准的对称纹样，两马长出了西域通行的双翼，其顶上各排列着四个即一共八个鸟嘴小兽头，并使之与马尾相互连接。

关于双马神和其他一些神祇是泛印欧语系人的共有神祇这一现象，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关于吐火罗文化中的重要专题，这一造型在整个亚欧大陆上古文化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

四、猛兽袭击偶蹄目动物的造型

亚欧草原艺术中的猛兽和猛兽袭击偶蹄目动物的形象，是最鲜明的草原形象之一，从黑海之滨到鄂尔多斯高原，见于白种人和蒙古种人各民族文化。这一造型在我国习惯上被称为虎噬羊的造型，但这种叫法忽略了亚欧大陆的整体性，因为，西亚和地中海地区不是老虎生活的地区，但却是猛兽袭击偶蹄目动物形象最早形成的地区，后起的匈奴虎噬羊造型实际上受到了更早的大西域狮子或格里芬造型的影响，很明显，格里芬造型的形成比草原民族的形成还要早好多世纪。

那么，我们就先来讨论格里芬造型的来源。

根据N.伊什詹茨(N. Ishjants)的说法，猛兽攻击偶蹄目动物是西亚艺术的特征，是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入小亚细亚，并经过斯基泰-塞克人传入南西伯利亚，后传入匈奴。^{[8][118 119]} 叶舒宪等人认为，格里芬的形象基础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翼狮”或“狮鹰合体兽”，认为苏美尔青铜浮雕《英杜格与双鹿》为其起源之一。这些造型经过辗转相传，通过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等，经由斯基泰和塞种等传播到阿尔泰地区，直到中国北方众多的动物造型和西南方的青铜艺术。^{[12]449-453}

可见，猛兽袭击偶蹄目动物最早、最典型的造型是西亚古老文明中的狮子袭击公牛造型，是格里芬的来源。当这一形象传到草原后，被改造成了种种草原特有的形式。

受西亚文化影响，斯基泰民族钟情狮子、豹子与鹰头格里芬的造型。而越往东边的部族，例如前匈奴和匈奴等民族则钟情于老虎、龙、凤凰和鹰（纯粹的鹰）的形象。这些说明，靠近黑海的草原文化受到了古希腊和西亚文化的重大影响，靠近东边的草原文化特别是匈奴文化，则受到商、周、春秋战国和秦汉文化的重大影响，而亚欧大草原中间地带的各文化则含有东西方文化的混合特点。如斯基泰的剑鞘上常刻划了希腊诸神和格里芬，而阿尔泰文化中不仅见有格里芬和斯芬克司，也常见有凤凰造型，而汉朝时代匈奴牌饰上常见有秦汉龙的造型，匈奴官印与汉族印章无异，匈奴铜镜也是汉族样式的无柄铜镜，而不是西亚流行的带柄铜镜。^①

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毛织品、皮毡和木雕等绘有格里芬造型。巴泽雷克一件《有六只挂须边饰的毡毛马鞍垫子》（前5世纪）上，绘有两边对称的一双格里芬袭击羚羊或鹿的造型。还有一件木雕表现了格里芬张开大嘴吞噬鹿头的造型（图14），这个鹰头的头上附有灰色的狮子般的须发，脖子处有两只鹰的浮雕，被认为是格里芬，还有点像凤凰，在巴泽雷克一件丝绸锦缎上，有类似鹰头的凤凰造

①埃及有柄铜镜的历史上限可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以后传入希腊。我国齐家文化铜镜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边沿有两孔，是否供装柄或悬挂所用不能确定，或者齐家文化铜镜来自于西域也未可知。



图14 巴泽雷克的类鹰(格里芬)木雕,公元前5—前4世纪,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图16 似鹰鸟头青铜杆尖,乌尔斯基2号古墓,前5世纪



图17 宰姆巴勒喀出土,斯基泰黄金当卢之大母神塔比提—维斯塔,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型,通过这个木雕,我们看到来自中国的凤凰造型与格里芬造型得到了某种融合。

斯基泰的格里芬造型不仅具有草原的特征,也吸纳了古希腊古典主义的写实特征,特别强调鸟头、长颈和狮身的造型。第聂伯河下游奥尔忠尼启则(Оржоникидзе)托尔斯坦山古墓,发现一个金光灿烂、精美绝伦的《格里芬、人物和众兽斯基泰胸饰》(前4世纪),包含三组各一对格里芬袭击马匹的不同姿态,两组狮子袭击野兽,人物以及众牲畜的造型,尤其是格里芬袭击马匹的几个不同姿态造型逼真,胸饰出色地表现了游牧生活的主要方面,结合了草原、希腊和西亚的综合艺术因素。第聂伯河梅尔古诺夫古墓(Мельгунов курган)出土的格里芬造型(图15)很奇特,仿佛是一种尖端武器,格里芬侧身造型类似亚述一波斯墙壁琉璃贴面上的样式,其尾巴具有蝎子特点,属于西亚的特征,格里芬的翅膀变成了鱼,它还装上了弓箭和一只持弓的手。

斯基泰民族的纹样中也有类似巴泽雷克木雕鹰头的单独似鹰鸟头的造

型,如乌尔斯基2号古墓(Ульский курган No2,前5世纪,图16)出土一带铃铛的青铜杆尖,描写了一只有巨大鹰嘴的鸟头,有一个圆形的眼睛,与巴泽雷克木雕鹰头相类似,头颈上也有像鬃毛状的小兽造型排列,最下的一个变成了人眼,鸟脖子处刻有一个大角羚羊,这个带铃铛和人眼的器具可能是萨满的法器。

老虎是前匈奴—匈奴民族青铜艺术中典型的形象之一,老虎袭击牛羊的造型显然受到了格里芬的影响。阿尔让铁制匕首的装饰部位,装饰着对称的猛兽造型。箭镞上装饰着金的鹰与羊搏斗图形,这些虎豹造型具有前匈奴的特征。鄂尔多斯高原阿鲁柴登出土极为著名的《四虎食牛金饰牌》(战国时期,约前3世纪)为桃红巴拉文化的卓越代表。

南西伯利亚出土的一件匈奴类型的《一对猫科猛兽袭击羚羊黄金牌饰》(前3世纪—前2世纪),竖排列的对称构图,猛兽从下面往上,绕过羊的大角,从外侧咬住飞奔的羚羊脖子,大角的处理具有强烈的斯基泰野兽风格。

匈奴人不仅仅喜爱老虎造型,西亚猛兽袭击食草动物的形象也为匈奴所喜爱,例如在诺音—乌拉6号墓地,发现有匈奴丝绒毯毯,其中一件所绣丝绒图案描写了格里芬与驯鹿和牦牛之间的格斗,造型十分古朴,袭击驯鹿的格里芬的双翼与尾巴都是一样的翼形造型,与牦牛格斗的格里芬的鬃毛与尾巴描绘得像装饰绳一样,在空白处有类似巴泽雷克壁毯上的抽象纹样。

N. 伊什詹茨评价说,匈奴毯毯和丝织品上的神话动物,基本上属于中国特色,但受到斯基泰、阿尔泰和西亚文化影响,是中国特色织物受到西域影响的实例。^{[8][19]}通过对各个地区狮子和格里芬造型的比较,可以看到,整个亚欧大陆的文化是具有广泛联系的。

五、“一人双兽”的造型

在上古,西亚大母神造型中有“一人双兽”的纹样,也就是母神站立在两只野兽之间的造型,一些学者推测其最早的造型可能来自埃及,^{[9][2]}但根据我的资料和魏庆征的观点^{[1][0]},似来源于小亚细亚的沙塔尔—休於遗址(Catal Hüyük),那里有极为古老的黏土母神坐像,两边蹲伏着双豹。后来,这一造型广泛流传在亚欧大陆,产生了种种变化形式。郭物的论文《一人双兽考》以详实的图例讨论和比较了这种纹样,^{[9][3]}结论是这种纹样与西亚和埃及早期母神文化有关,被以后的文明所继承和发展。

黑海斯基泰人的大母神塔比提往往被表现为一双兽造型。塔比提(Tabiti)是希腊女灶神赫斯提亚(Hestia,相当于罗马之维斯塔,Vesta)的斯基泰称谓,根据希罗多德《历史》,斯基泰称赫斯提

亚为塔比提,希罗多德在另一处还提到过与大力神相结合的半人半蛇的女怪^[11]。塔比提的形象大概为具有一对背翼、下身蛇尾的女神,其牺牲为野兽、鹰、狗等。北高加索库班地区(Кубань)克列尔梅斯基古墓出土有一件圆形黄金牌饰(前7世纪~前6世纪),牌饰中心为玫瑰纹,中心有两个焦点,各放射三根光束,加上穿过两焦点之间中心的一根直线,这些线将圆形分为八份。其中,一部分刻有对斯芬克司和种种动物相搏纹样;另一个部分为一人双兽造型,描写了带双翼的斯基泰大母神塔比提—维斯塔制服双兽的情景。在第聂伯河与亚速海之间的宰姆巴勒喀(Цымбалка)出土一黄金马头当卢(前5世纪左右,图17),当卢是保护马的面门和鼻子的长形金属挡板,宰姆巴勒喀的当卢上表现了正面站立的塔比提—维斯塔女神,身穿有涡卷胸饰的连衣裙,头顶是展开的双涡卷托住12花瓣的椰枣纹(棕榈饰),裙下分有一对带角的蛇身兽头动物,女神双手按住两兽角,角兽以下又是一对蛇身格里芬和一对涡卷,再下面是复杂的双蛇盘缠纹。

在小亚细亚西岸迪迪马(Didyma)的古希腊阿波罗神殿,有一正面带翼女神浮雕,与宰姆巴勒喀出土的黄金当卢上的斯基泰大母神造型相似,比较一下即可知道,斯基泰大母神的造型是对希腊艺术的模仿。

前面我们提到的大月氏“黄金之丘”3号墓《双龙守护国王金头饰》双龙造型,实际上也是“一人双兽”的造型,“黄金之丘”艺术造型的意义在向我们展现了草原、中亚、印度、波斯和希腊化艺术等因素的混合。

以上情况说明,“一人双兽”的造型在亚欧大陆古代各文明中的影响非常广泛,具有普遍的图案学意义。

六、与龙有关的造型

龙的形象和类似龙的形象也时常出现在草原艺术之中,这些龙的造型或来自中国龙的形象,或来自巴比伦—波斯,或与一些奇异的神兽或爬行类生物有关,或者各种造型的混合。

就我所知,东北亚最早的龙形动物艺术造型与“玦”有关,其来源可能强调了动物流线型的灵活身躯,也可能与爬行类的动物造型有关,这些造型可能影响了青铜时代的龙形造型。在冬宫“彼得大帝”的西伯利亚收藏品有一件与《阿尔让龙形猛兽》几乎一模一样的青铜龙形猛兽,只是没有张嘴,头尾稍稍空开一些。类似的造型在其他地方也有出土,说明当时重复铸造了一批相似的东西。旋转的猛兽造型也与龙形造型有关。

与“玦”造型有关的纹样与后来中国龙的造型



图18 双龙形怪兽薄铜片,巴泽雷克古墓出土,前5世纪



图19 特勒—哈拉夫,阿拉米亚的卡帕鲁王宫人、鸟、蝎混合巨像

似有渊源关系,当中国龙造型形成后,便传到了大草原,这些造型见于前匈奴、匈奴及其以后各北方草原民族文化,影响至蒙古高原的西部和西北部。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彼得大帝藏品”有一件《透雕镶嵌双龙纹金牌饰》(前4世纪~公元4世纪)来自草原,其造型与宁夏同心县出土的匈奴龙一样,也就是秦汉龙的造型,但制作特点和“黄金之丘”《双龙守护国王金头饰》是一致的,属于草原黄金技术,具有红绿宝石镶嵌。这说明中国龙的造型早已传播到草原和中亚,而且从结构上看,双马和双龙显然极易融合为一体。

还有一类龙形造型与西亚有关,而与中国龙无关,似乎与西亚,如巴比伦、埃及、波斯的关系更为密切。

巴泽雷克有一件《对称的双龙形怪兽薄饰片》(铜制,前5世纪,图18),造型类似龙,但没有中国龙的特征,嘴部有鹰的痕迹,身体和尾部造型显示出龙、格里芬或虎豹混合特点,与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早期文化中的龙形怪兽具有联系,但也具有草原自己的一些特点。巴泽雷克双龙形怪兽的脚与阿拉米亚《卡帕鲁王宫人、鸟、蝎混合巨像》(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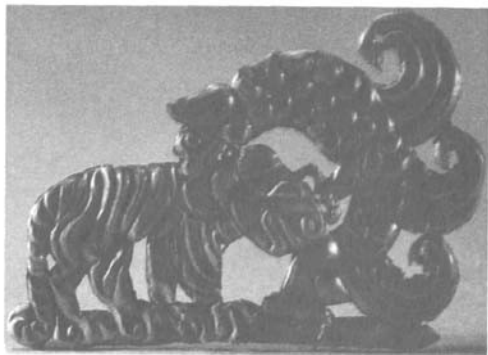


图20 黄金怪兽啄虎饰牌 吐鲁番交河沟北1号台地1号墓出土, 汉代

勒-哈拉夫出土, 图19) 的脚与极为相似, 头与颈部则与米底亚青铜双龙形造型类似, 但加上了马鬃, 这些造型进而使人联想起古埃及、巴比伦的龙形艺术造型。

吐鲁番交河沟北1号台地1号墓出土一汉代《黄金怪兽啄虎饰牌》(图20), 表现了虎与一只鹰嘴龙身具三个巨大背鳍的怪兽格斗, 龙身怪兽似大西域的鹰头格里芬与龙的混合体, 类似的青铜虎鹰相斗饰牌在我国北部和东北部各地的匈奴文化中比较常见。可见, 格里芬和龙的造型在匈奴民族手里被混为一体。

从这些情况看, 草原艺术融合了来自东亚和西亚的艺术因素, 但加上了草原自身的特色。

结 论

草原民族的艺术造型决不仅仅限于上述造型和手段, 我们在此仅讨论了其中比较有特色的一些造型, 根据这些讨论, 可以获得以下一些基本结论。

其一, 草原艺术的造型十分丰富, 其中一些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原创特色, 如大角鹿、双马神的造型。

其二, 草原艺术的造型充分体现了草原艺术家对动物的观察, 其环形和旋转的造型十分出色。但环形造型的起源可能与东北亚早期玉文化有关。

其三, 通过研究某些特别的艺术造型(如格里芬、一人双兽、中国龙、西亚龙), 可以看到, 草原艺术不仅有所属区域的自身特点, 也是古代文明交流和融合的结果, 它们包含了整个亚欧大陆许多古老文明的因素, 这说明, 草原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交流的场所。

其四, 亚欧大草原东西跨度过大, 就必然导致东西方的差别, 越靠西边的就越是受到西亚和希腊的影响, 越靠东边的则越受到中国的影响, 中间的则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

因此, 草原文明对世界历史也具有伟大的贡献, 草原艺术应被列入伟大艺术的行列, 草原野兽纹样的造型艺术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我个人认为, 在动物纹样的创造上, 迄今为止, 没有任何其它地区的民族比得上草原民族, 而所谓“野兽风格纹样”的形成历史可能很早, 与早期石器文化有关, 也与周边各大古老文明的强烈影响和民族迁徙有直接关系。当我们要对世界古代文明加以整体思考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忘记草原文明, 如果忽略了草原艺术, 我们对整个艺术史的研究就势必缺乏客观性、公正性和完整性。

参考文献:

- [1]王治来. 中亚史(第一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45.
- [2]叶舒宪、萧兵、(韩国)郑在书. 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上册)[M].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 [3]林梅村. 阿尔泰山和天山的大石冢[G]//余太山欧亚学刊(第三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101-112.
- [4]邓聪. 东亚珉饰四题[J]. 文物, 2000(2): 35.
- [5]杨虎、刘国祥、邓聪主编. 玉器起源探索——兴隆窪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M]. 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2007: 126.
- [6]林梅村. 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M].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 2000.
- [7]Кемаль Акишев, Акишев, Казакстаннын Көне Алтыны, Алматы, 1983: 68-689, 72-73, 219.
- [8]雅诺什·哈尔马塔、B·N·普里等主编. 中亚文明史(第二卷)[M].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
- [9]郭物. 一人双兽考[G]. 载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四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2, 33.
- [10]魏庆征编. 古代两河流域与西亚神话[M]. 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9: 23.
- [11](古希腊)希罗多德. 历史(卷四)[M]. 王以铸,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268—288.

(责任编辑: 夏燕靖)